

博物館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，我們今日對博物館的定義，一定不同於十八世紀。博物館最初的設置原因亦與其日後功能不盡相符，創設時多半依隨當時需求，然其功能卻會因贊助者、管理者和社會情境而改變。無論時代如何變遷，博物館最初的設置意圖仍會或多或少留存。當前博物館之設



大英博物館前館長安德森博士，應邀來台擔任故宮南部分院的評審委員。（陸仲雁攝）

The Changing Roles of Museums

博物館的角色變遷

演講者 羅伯特·安德森
記錄 劉宇珍

安德森博士 (Dr. Robert G. W. Anderson) 是大英博物館前館長，去年底受邀來台擔任故宮南部分院建築國際競圖的評審委員，並在故宮進行一場公開演講。在思考南部分院未來的定位與走向時，我們有必要了解博物館的角色變遷，以及未來發展的可能方向。本文是演講的摘要。

多有強烈的教育功能或美學考量，有時還負有國家主義的使命。演講中將不時回顧這三個層面，並藉此思考未來博物館的可能角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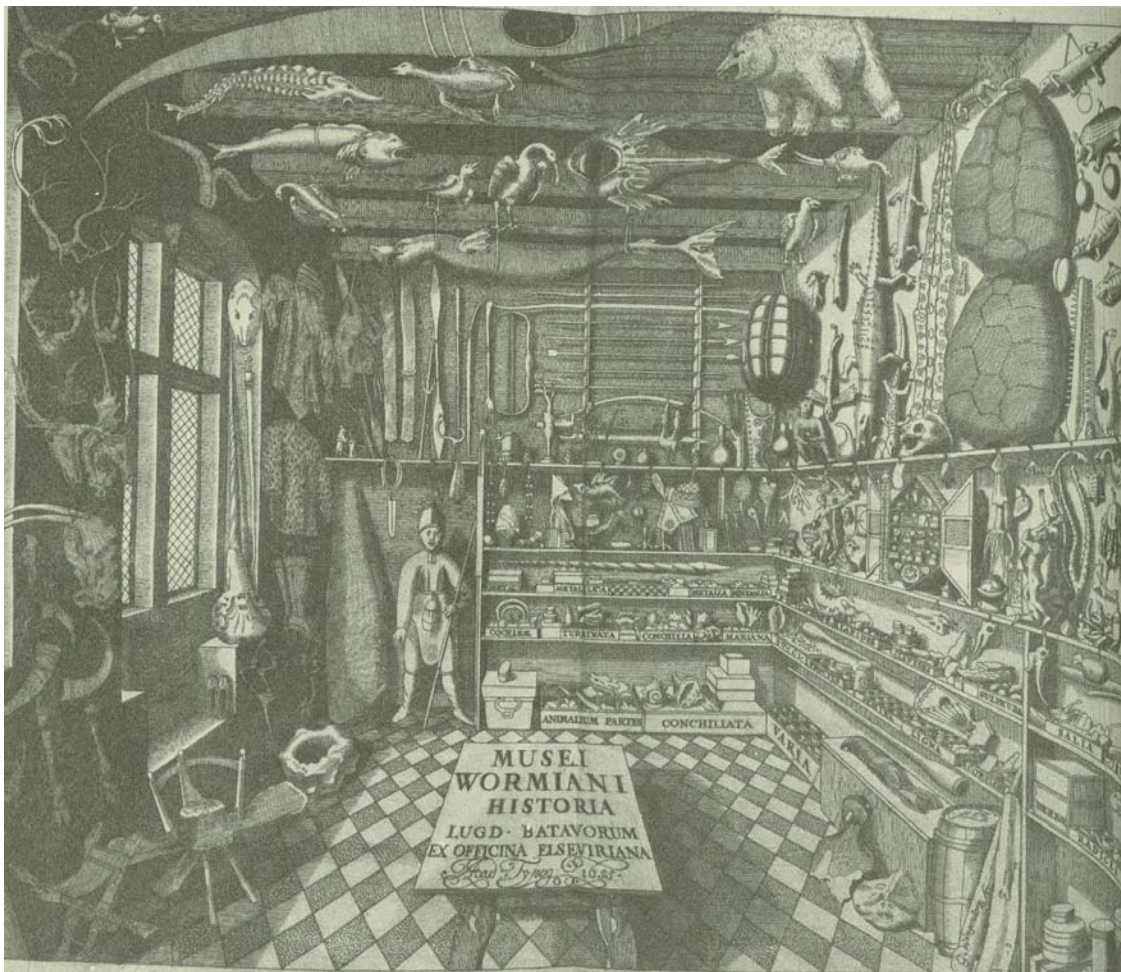
早期——搜奇誇耀

最早具有博物館性質的，應屬歐洲中古末期至文藝復興時期權貴之士的「珍物陳列室」(Cabinets of Curiosities)。嚴格說來，這並不是開放給公眾參觀的博物館，只算是私人收藏，不過其陳列狀況大致類似今日博物館。它滿足了富貴人士搜奇聚珍的心理需求，也有意無意地展示收藏者的財力、權勢、品味與智識。正因為具有誇耀性質，這些收藏自然不可能全然

幽居於私人館閣。開始時，某些人可以獲准參觀；到後來，漸走向公開展示之途。許多皇室收藏即為今日著名博物館的基礎，如法國羅浮宮與俄國聖彼得堡的冬宮；今日的故宮博物院亦是如此。皇室收藏總是吸引大眾的目光，它們一方面引人發思古之幽情，一方面又直指當年特殊的社會階級。某些近年新建的公共博物館也具有這種羅列珍奇的性質，像是收有玉器、書畫、青銅與瓷器的上海博物館，這些收藏品無疑是過去上層階級的雅玩。

十七世紀——研究之用

第一座公共博物館由珍物陳列室演變而來。十七世紀的歐洲社會瀰漫著一股收藏的風氣，然卻不再只是為誇耀財勢，而是出於對世界的濃厚興趣。跨洲跨洋的旅行增加人們接觸異域事物的機會，採集回來的自然標本更值得分門別類研究。為讓人們理解不同物體間的相互關係，遂發展出科學分類的系統。由於博物館內的標



十七世紀科學家Ole Worm的收藏室，琳瑯滿目的動植礦物標本，使得珍物陳列室漸漸走出主人的個人癖性，開始有了研究的價值。（圖片引自Edward P. Alexander, *Museums in Motion: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Function of Museums*, 1979）

本都有來源出處，歷史脈絡清楚，可以作為研究時的一手材料，博物館自此成了科學研究的重地，至今不衰。許多自然史博物館幕後皆有研究群和數以萬計的標本，然博物館多半只對外展出藏品的一小部份。博物館所收之物在當時便被認為具有經濟效益。一六八三年，世界第一所公共博物館在牛津大學成立，其收藏乃由化學家及古董收藏家Elias Ashmole所捐贈；Ashmole當時即指出其自然史標本的經濟效益，如礦石可冶煉、植物可製藥等等。

十八世紀——認識世界

另一個博物館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是Sir Hans Sloane。他一七五三年去世後，將藏品全數捐給英國國會，因而促成大英博物館的誕生。從礦物標本到錢幣、手稿、素描、古董、書籍，他無一不收，還有一些中國的文物，藏品也因而有了跨國際的向度。一七五九年一月，大英博物館開始向大眾開放，免費入場，至今仍執博物

館界牛耳。成立之初，它將焦點放在「認識世界」上。二〇〇三年

時大英博物館新

設一「啓蒙時

代 (En-

light-en-

ment) 』

陳列室：大家

到倫敦時千萬要

去瞧一瞧，因為

它展示了大英博

物館最初七十年

的發展（一八三

〇年），呈現其重視客觀

性的科學取向。而世上

其他博物館亦然：如美

國的史密森尼恩博物學院

(Smithsonian Institute)，雖遲至一八

四六年才成立，亦本著啓蒙時代的

精神。即如其創辦人James

Smithson所言，此博物館之設乃

「爲了知識的增益與傳播」。



一六八三年對外開放的Ashmolean Museum，位於英國牛津大學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館之一，除了自然標本外，其東方藝術收藏亦十分可觀。

十九世紀——公共教育

到了十九世紀，博物館傳布知識的功能尤為突出。在高等教育侷限於中產階級的時代裡，博物館提供無錢受教育者增廣見聞的機會。在這方面英國又開風氣之先。一八五一年，維



一七五九年對大眾開放的大英博物館，總是吸引世界各地遊客的目光。

多利亞女王的夫婿愛伯特大公在倫敦策劃一大型國際博覽會，展示世界各地製造工藝。短短五個月裡，湧入了六百萬參觀者，當時全英人口不過才二千萬人，且主要的觀眾群來自勞

工階層。一八五七年，維多利亞與愛伯特博物館（Victoria & Albert Museum）成立；這具有公共教育功能之博物館的原型，其本意雖在教人認識工藝產品與優良設計，卻也由

此發展出「裝飾藝術」（decorative art）的概念。

此外，維多利亞與愛伯特博物館更將展品出借給地方小博物館，這樣的模式一直持續到廿世紀；故宮在南部設分院應該也是出於相似的態度。不可否認的，箇中當然有其政治考量；然撇開政治不談，這樣的作法也是一種合理的作為，因為國家收藏畢竟應屬於全民，而不只是首善之都。一些集中於某些大城的專業技術，例如修復保存等，將來也必定因此擴散至有需要的地區。

廿世紀——博物館大擴張

時至今日，各地方各鄉鎮幾乎都有類似博物館的機構。這些博物館通常代表地方的驕傲，其收藏也多以地方歷史、產物或出土文物為主。在一些大城市裡，有財力之士常經由贊助或捐贈，使其名姓與作品或博物館相連，意圖同臻不朽。這種情形在美國特別普遍，博物館遂被比擬為「廿世紀的天主教會」：那些富有的藝術贊助者，就像是過去君主與豪富對教會的贊助一般。然而，博物館急速擴張的結果，卻也一度出現專業人數不足的窘境。在上世紀初的諷刺漫畫裡，博物館策展人像在開古董舖子似的，只具有個別文物的零散知識，卻無法提供觀眾一整體視野。由是，「如何成為博物館專業人員」的學問漸漸發展，博物館間的聯盟組織也相繼成立，大學裡也開設了博物館學的研究所課程。然二次大戰後，相關課程如雨後春筍般成立，安德森博士遂有感培養出的人才實已供過於求，市面上更出現不少博物館學書籍，出自於從



維多利亞與愛伯特博物館（Victoria & Albert Museum）成立於一八七一年，收藏世界各地的工藝品。照片裡的舊牆，留有二次大戰炮火的痕跡。

未在博物館內工作的專業人士。安德森博士認為目前浮現了兩種博物館書寫的文化體系：一種由實際的博物館從業人員所書，另一種則由學院中博物館學研究者所寫，兩者間沒有什麼論述交集。

休閒與旅遊

是什麼促成了廿世紀博物館的勃興呢？休閒、旅遊、國家主義與政治，都是促成這股潮流的要素。廿世紀晚期，愈是進步的國家愈重視休閒，博物館遂成了閒暇時最有意義的去處，英文字彙「edutainment」（寓教於樂）也因而生。為滿足個別人的不同嗜好，一些如足球、汽車：等特殊的博物館因應而生，然這類博物館通常以營利為考量，缺乏對主題的整體思維；即使這類主題展覽在國家博物館內舉辦，亦多無法展現宏觀的視野，只樂於呼應大眾的需求。由於旅遊的發達，博物館被視為異國城市中最值得造訪的地點。近年大英博物館來自海外觀眾的比例竟會高達百分

之七十之多，這引起很大的討論；因為大英博物館一方面是由英國國民稅金支持的國家博物館，理當服務英國國民；然另一方面國家又需要旅遊業來刺激經濟。不過博物館自己也知道不應過分討好海外遊客的需求，畢竟他們可能一輩子只來一次。然這樣的旅遊人潮確實引發了文化混淆的問題，並需要重審博物館營運的輕重緩急。

國家主義與政治

廿世紀的確有不少博物館被當成政府宣揚意識型態的工具，尤其是前蘇聯等共產國家。但即使是自由社會的博物館，亦隨處可見政治與國家主義的身影，如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館（Imperial War Museum）在提及納粹與日本時就不帶一絲同情。這類政治歷史性博物館（political-historical museum）其實是廿世紀的有趣現象，因其設置乃是基於「物品會說故事」的想法。藝術或自然史博物館展出的是物品本身，歷史性博物館所展

示的卻是個故事。然國家主義依舊現身於藝術或自然史博物館中：如慕尼黑德國博物館（Deutsches Museum），其名人堂所陳列的科技英雄全都是德國人，或至少是德語系的，直到最近才出現一個說法文的化學家Lavoisier，由此可見其民族主義傾向。

未來——廿一世紀

接下來的博物館該怎麼走呢？安德森博士樂觀地認為，從文化的角度來看，博物館應有值得期待的未來。現在的博物館已不像十七、十八世紀時期那麼著重物件本身，但歷史性博物館在運用物品時又像在搬弄舞台道具，因為他們仍需立基於文本。某些科學中心為了教導科學原理，刻意創造些「教具」展示，這些東西抽離展覽脈絡後便一點用處也沒有。這意味著廿一世紀博物館的範疇已經愈漸寬廣、包羅萬象，博物館的角色將持續增加，「純粹的博物館」也將大幅減少。

博物館的社會角色

今日，博物館常被當成具有社會功能的機構，未來應該也不會改變。在英國，政府曾將博物館描述為「改變社會的推手（agents of social change）」，文化部部长Chris Smith便曾表示，博物館應致力於消彌社會藩籬（social exclusion）。博物館的社會藩籬有四個層面：一是機構上的（如開放時間侷限於某些時段）、二是個人或社會上的（如缺乏相當知識或財力則無法觀賞等）、三是概念上的（讓觀眾覺得「那不是屬於我的地方」）、四是設施上的（如缺乏無障礙空間或位置太過偏僻等）。「泯除社會藩籬」的理念實與傳統的博物館大相逕庭。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可說是傳統博物館的代表，其現任館長 Philippe de Montebello曾於一九九七的訪談中表示：菁英主義不只可以與「民主」的觀念相容，它本身就是民主的精髓——要將大眾帶往更高的層次；大都會博物館本來就很菁英，就像藝

術一樣，大家來這裡就是爲了要跨越門檻，加入菁英的一群。

Chris Smith的提議是不是會將博物館變成人人都可以去，卻沒有人想去的「地方」？而Montebello館長期望大眾能自然而然的跨越至更高層次的理解與欣賞，是否又有點不切實際？或許我們不應該規定博物館都採行同一套政治或文化立場，而應鼓勵博物館的綜合性發展。我們同時也看到古根漢美術館的例子，近年他們將博物館視爲商業效益與文化利益並重的整體，其經營技巧顯然來自MBA文化，而非傳統博物館學。雖然我們仍無法預料這樣的趨勢是否會在廿一世紀普遍流行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有愈來愈多的博物館館長來自商界，而非學術界。

博物館的挑戰

當然，今日博物館也面臨更多挑戰，尤其是來自壓力團體的監督。一九八九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館(Royal Ontario Museum)舉辦「深

入非洲之心 (Into the Heart of Africa)」展覽，敘述傳教士對館藏非洲文物的搜羅之功，即遭「非洲真相聯盟 (The Coalition for the Truth of Africa)」的抗議。雖然該聯盟的訴求與展覽內容不盡相符，但他們最後仍成功地讓展覽提前落幕。無獨有偶，一九九四年華盛頓航太博物館 (Air and Space Museum in Washington) 展出二次大戰時投

下廣島原子彈的飛機Enola Gay，並反思多少美國人因此得生，多少日本人因而家破人亡的問題。然此舉卻受到退伍軍人團體的抗議；憑著他們在國會裡的強力後盾，博物館館長因而下臺，並移除爭議性的說明文字。牽涉到政治論爭的歷史展覽無疑會被壓力團體所運用，而其迴響也多受政治動機所鼓動。然而，博物館策展人是否像大學教授一樣擁有學術表達的自由？安德森博士個人的答案是否定的：因爲博物館面對的是公衆論壇，而非流通量極少的學術期刊；策展人應該要

意識到，他們是公衆人物，而非學界中的隱者。

博物館的國際化

廿一世紀的博物館究竟能國際化到什麼程度呢？這個問題對故宮南分院的創建特別重要。安德森博士認爲，扮演國際化與多元文化的角色，將爲博物館帶來很大利益；可惜除了少數大型而古老的博物館外，持此態度的仍不多見。雖然全球化的浪潮席捲而來，博物館仍面臨著將視野專注於本土的壓力。有部分原因在於某些歷史悠久的國家要求償還被「掠奪」的國寶文物，許多國家也限制境內文物與出土品的出口，這無疑阻礙他國公共博物館購增藏品的可能，連帶使得各國的文物無法同陳比較。安德森博士認爲各國應該對公共博物館開放適度而謹慎的文物出口，否則只會讓更多博物館侷限於本國的規模；而在這樣的環境下，故宮南分院欲擁抱亞洲文化的鴻圖，應值得大家喝采。